

我父亲在 1989 年，历经了 100 多天痛苦的疾病折磨之后，于 3 月 6 日凌晨，静静地咽了气。

3 月 7 日，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王晓棠阿姨挥泪写就一篇祭文，发表在由我父亲晚年创刊并任主编的《八一电影》杂志头版上，她的文章原文如下：

你乘着春风去了。在午夜，你体贴地，连床边守护你的孩儿也没惊动，飘然起身，掠过北京三月春意朦胧的树梢，抚过天安门烈士纪念碑碑顶，拢半袖料峭春寒，揣满腹对尘世的眷恋，轻轻一叹，直上重霄而去……

你乘风而去既高且远，远行复远行。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因你此生与春同驻。你待人和煦像春风，诲人细润似春雨；温厚比春日、文思如春潮。连你知名的小说和电影也取名为《野火春风斗古城》。我有幸在其间塑造了两个姐妹人物，由此结识了你。

你此番远去行色匆匆，我还未及告诉你：上月，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罗伯特夫妇来华选片，看此片后诸多褒奖，说它是一部各国观众都会接受的好影片。你的痴女小龙掩面低喃：“爸爸要听到会特别高兴。他去得太快，太屈了！”面对你的两个娇儿和爱妻淑文，我酸楚却又宽慰，他们在极度悲痛中仍能庄重自持，显示出这个家庭的教养和品格。这是你留给社会的又一财富，也是你光华的折射。

春风当然要送你，只为你宠辱不惊的淡泊。得意时如斯，失

意时也如斯；只为你不忘故旧的敦厚，鱼水乡情永记，贫贱之交不移。更为你的耿耿丹心，虽历尽苦难，信仰始终不渝。然而，我也有过忧虑，你过细了。过细，使你当年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化险为夷，也使你而今早生华发，一病不起。你为中华民族的兴衰长夜反侧，恨不能以书尽人间不平事，唤起四海同此心。

你就这样乘风去了，携着你那支力重千钧的笔，直奔天路。从此，我将翘首仰望：当天际现出长虹，那就是你，是你在挥臂洋洋洒洒，为人间绘制七彩幸福之门！



父亲晚年照



本文作者写作此书时的情景

作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书法家，我的父亲李英儒，他一生并非仅文学一条路。一个人的一生，当你看到他生命的终结，你才发现人类生存的寿命实在是很短很短，亲人故去带给世人的巨大悲苦中有一种哀怨几乎是共通的，为什么他不能再多活几年？

这种哀怨是无用的。

死亡，是人生绝对要遇到的一道深渊，你看到亲人到了深渊的边缘，却有手不能拉住他，有身体不能挡住他，眼睁睁看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飘然间连你的灵魂也随之而去的瞬间中，或哭或无语都无法替代你心底里的呐喊。

我陪父亲在医院整 100 个日日夜夜，眼睁睁看他走完人生最后这再也摆脱不了的巨大痛苦，欲哭无泪中，写完了以下全文。

上 篇

30年前的“六一”，不是为了儿童的欢乐而庆祝的日子。《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说被改成话剧、评剧、大鼓书、单弦。马泰、魏喜奎、喜彩莲扮演主要人物。王晓棠因一人成功地扮演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姐妹，获得了当年度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可是30年前的“六一”却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常的一个“年代”的开端。

那是1966年的5月31日，我同许许多多大人一样，于当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收听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第二天，1966年的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如果说这张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真正点燃的日子那么，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浴血之战初吹的号角。《通知》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它给了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副市长吴晗无法承受的一击。这个通知是发给各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

印着红头的文件放在爸爸的床边，爸爸从总政参加学习回来就反复琢磨这份文件。一遍又一遍地把味着“五一六”通知的意义。

爸爸把我们在家的 4 兄妹叫到一起，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

我至今不忘的是爸爸从始至终没有展露过一次笑容，这使我在 30 年后仍然清晰地记得“五一六”通知的几则内容：

“中央决定撤销原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原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彭真一个人搞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例如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懂吗？”爸爸扫视我们几人一眼后问道。我当时立刻懵里懵懂地说“不懂”。我没有想到从此以后，竟有十年的时间足以让我由不懂变成刻骨铭心的伤痛。爸爸也想像不到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



“文革”开始时的李小龙

大革命，理应包括当时尚属儿童的我。爸爸目光盯着哥哥和姐姐说：“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回合，党内运动我经得多了，我看没有比这次声势更浩大的。”那时哥哥上高三，姐姐在初三，小哥刚进中学，我正准备参加升中学的考试。

姐姐问爸爸：“那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

爸爸皱着眉头说：“你们不要到外面去说，好好复习功课。”

姐姐笑了：“所答非所问……”

1966年5月25日，我还在小学校的课堂里抄写一大篇一大篇升学考试的复习题，那份由聂元梓领头签名的、题目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掀起了一发不可阻挡的洪流。这份向学校当局提出挑战的大字报写着：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这种激昂的言词样式在以后几个月乃至若干年中不断地使用和发展着。这是大字报所产生的结果之一。

而更重要的结果是《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赞扬的评论，它写道：“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

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社论号召：“坚决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展开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要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两个月的红卫兵小报曾写过：“社论的春风一夜吹绿了所有校园。”更有嫌这种比喻缠绵无力的提醒道：“战鼓已敲响，炮口直指反革命黑帮，轰！轰！轰！”

从那个年月起，我就懂了，社论是政治的风向标。

当高音喇叭扬颂着自己的威力，你终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播音员那种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播送，声潮时刻撞击着你的耳膜，在这种迅速强化的普及教育下，不由得你不卷入这场政治运动的旋涡中去。

北京的各大院校在几天之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糊满了校园，学校的教授和领导最先当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

哥哥是铁道学院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是学校几年来重点培养的党员苗子。他对爸爸说，学生中很多人砸课桌、椅子、黑板，拆毁、捣烂了学校公用设施，对教师的人身攻击也越来越凶。“革命”伴随着极大的破坏性，看来停课势在必行。校领导和党总支找哥哥谈话，希望学生会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他刚刚向学生会和团委提出这些要求，立刻有人说他是“保皇派”。爸爸说：“不怕，你有群众基础，遇事先不急于表态，多学习，掌握局势变化。”

停课，大学停了，中学停。6月份，我的升学考试终于在满街都是大标语的运动气氛中消失了。起初听到不用伏案做题，我感到一阵激动，高兴得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操场上跑起来。操场的西边竖立着宣武门教堂的一面墙，它也是校园的一面围墙。我们把书包抛向天空，想扔到教堂高墙上的玻璃花窗那么高，窗户上的五彩玻璃闪闪发亮、耀眼夺目……我大唱起“拿起笔做刀枪”的歌子来，一路踩着音乐点回到家中，我喜悦地告诉爸爸：“不用考试了，不上课了！”我像翻了身的奴隶一样，在屋子里大步走来走去“怨不得穷苦人民盼解放，我自由了！”然后又引吭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并随之手舞足蹈起来。

爸爸却像看着一只不认识的小怪物似地盯了我一会儿，问道：“你不遗憾吗？”

我停住脚，也为自己少有的狂喜感到几分难为情。爸爸说：“你不可惜 譬如说我手中的文章已经铅印了 修改三稿就要印刷成书了，突然接到通知说：书不出了。你的毕业成绩那么好，再考一次你会考进一个很好的学校，按部就班地读书，我指望你一直读进大学 读进‘北大’！现在全成泡影了，你还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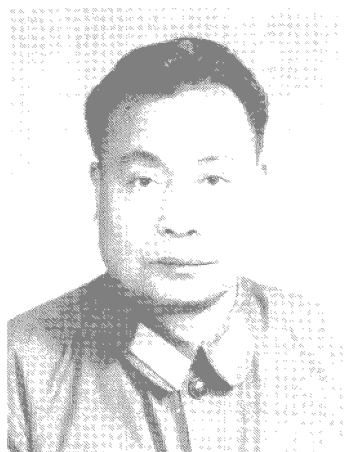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很窘。爸爸见状说：“好了 好了 我不是说你，不上课了，我给你和你小哥买个月票，你们到大街上和各个学校去看看大字报、看看‘运动’是怎么回事。”

我听了这个安排比过年还兴奋，整天不学习，还要到处去“玩”？这一天，我简直以为到了幸福的顶峰。

爸爸却无奈地放下了手中大本的铅印稿，这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大地春》。这份稿子已有两年的审查和修改经历了，几经总政文化部讨论、评议，终于打出了清样（这部小说于“文革”后出版，书名为《还我河山》），爸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完成于 1954 年。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版发行到海外。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单行本《沿河村的血迹》也颇为畅销。这部描写抗战的小说，创作手法十分朴实，生动曲折的故事和塑造鲜明的人物引起了许多专业人员和出版部门的注意。

1959 年，爸爸出版了第二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该小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十周年来优秀创作作品”成为庆祝建国 10 周年的一份贺礼。这部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小说被改成话剧、评剧等多种剧种上演。大鼓书、曲剧和单弦中“杨母跳楼”的段子极为流传。马泰扮演杨晓冬、魏喜奎、喜彩莲等均扮演主要人物。“文革”中，马泰还经常来到我家小院，和爸爸多次见面，虽然在“文革”中大家的服饰趋于统一，但马泰穿的布中山装，脚登的一双平底布鞋，

都掩饰不住他风度翩翩的神彩，饰演“杨晓冬”那样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确是十分合适。《野火春风斗古城》连环画的绘画者洪钊获得了全国连环画创作奖。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为电影，严寄洲任导演。王心刚扮演杨晓冬，王晓棠扮演主要人物金环和银环。王润身扮演关敬陶。陈立中扮演杨母。王晓棠因一人成功地扮演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姐妹，获得了当年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称号。可就在颁奖之际，文化大革命到来，百花奖评奖取消了。



“文革”开始时的父亲

爸爸停止了写作。

我当时不能体会他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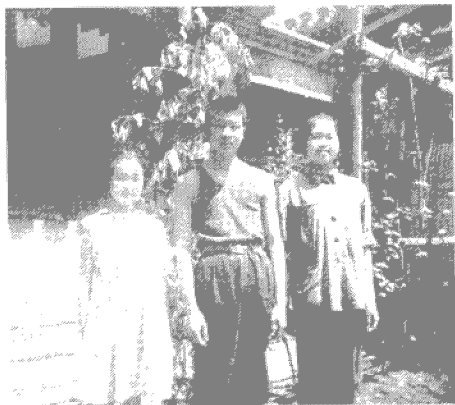
妈妈 12 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6 岁加入共产党。我 12 岁当上了红卫兵，看管了张志新的哥哥——张老师。哥哥当上了铁道学院附中的校革委会主任。圣母离开了圣像座，头朝下倒在一个角落里，好像和耶稣受难一样。

停课的最初阶段，姐姐带着我和小哥一行仨人每天一大早就乘车到府右街国务院办公厅看大字报。我 11 岁，小哥不过 13，姐姐则刚满 14。我们都煞有介事地拿着小本子记录。我们跑了师大女附中、一〇一中学，财经学院、气象学院等许多院



穿上父亲军装的李小龙

的皮大衣我都送人了，我们自己的军装可没舍得给。”妈妈不很高，有 1 米 64 左右，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高身材了，这和她从小没娘，在滹沱河岸撒着欢疯玩有关。她的家是抗日根据地



李小龙和哥哥李家平、姐姐李燕泥

校。

不久，哥哥和姐姐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爸爸拿起袖章左看右看，最后套在自己胳膊上在院中散步。哥哥翻箱倒柜找出几套黄军装在身上试穿，姐姐也同样效仿。妈妈观赏着他们试换衣服，不免有点遗憾地说：“这都是我保存多年的，你爸爸缴获鬼子

地 妈妈 12 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6 岁入党，她跟着大部队打过游击，也隐蔽到日伪占领的城市当过地下交通员，还背着孩子为党做机要秘书工作。妈妈有个灰布皮的军官转业证。我从小就听过她对转业的种种抱怨。逢此，爸爸便说：“你好好照顾家和孩子们，我不是还

在部队吗？你就把为我们服务看成是为军队服务吧。”我觉得这话好像有点自私，深爱爸爸的妈妈却浑然不觉，于是，爸爸几百万字的小说，便都是妈妈一字一字抄出来的。

爸爸看着穿上军服、戴上红卫兵袖章显得威风 and 英俊起来的一双儿女，禁不住拍拍哥哥的肩膀：“你们要是当兵，还真有个样子。”

姐姐笑着说：“我会当上兵的，你等着瞧！不过，哥哥现在不是兵，他可是官了。”“什么官？”爸爸半眯着眼问。

哥哥有点不好意思：“没什么，学校拟定成立文化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革命教师、红卫兵小将和校工联合组成领导班子，我被选在班子里了。”

“在班子里？”姐姐摇摇脑袋，满头乌发闪着缎子般的光：“又不是在戏班子，干吗说得这么扭扭捏捏的。”

爸爸则凝神问：“你的分工是什么？”哥哥稍一口讷，姐姐立刻抢着回答：“他是革委会主任！”

“是吗？”爸爸问，哥哥点点头。

“还不相信我，我听他们同学说的。好像我骗你们似的！”姐姐笑着说。爸爸假装嗔怪地“喝斥”了一句：“小壶易热！”接着转向哥哥说：“学生当正职？那革委会副主任是谁？”

“是校党委书记。”

“真是本末倒置！”

“不是我想当，是全校选举，我的票数最高。”

“那是一定的，学生的基数最大，你的票数当然就比教师高，这不能说明你就应当。”

哥哥并不着急地说：“这我知道，我找了老师和书记，他们告诉我，选举前都商量过，他们认为我在革委会里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也都投了我的票。”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没有文化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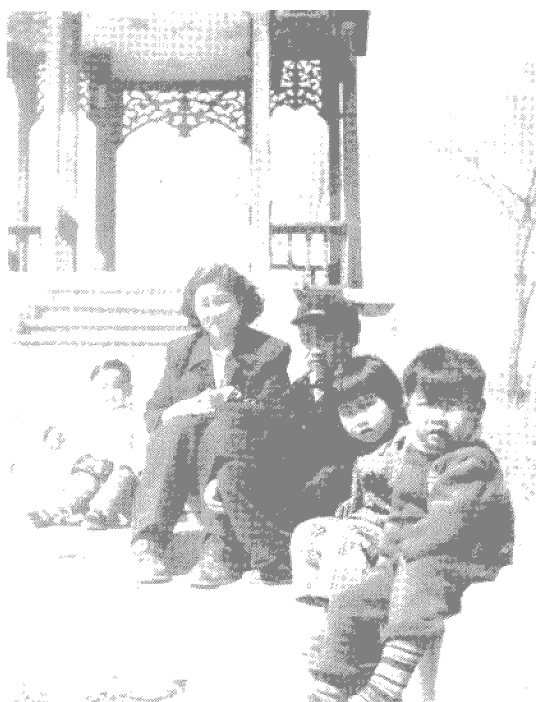
革命，哥哥必定算是学校培养的接班人，他的师生关系极好，校领导在“文革”之初，事事都和哥哥详细交流，仍旧在要求哥哥做好全校学生工作，他们曾说，我们现在说话不顶事了，你要管好他们。哥哥也始终和造反派划开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所以，后来学生运动发展变化最快的阶段，有人说哥哥是保皇派，坚决号召学生反对他当学生领袖。幸好哥哥充满徐霞客的游历精神，卷上行李，遍走祖国山河去了。直到今天，他这“精

神”不改在跋涉边远荒僻地区的旅游区中的游客里，年龄最大的就是我哥哥。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是辞了，坚决辞！要当也只能当副的。”

哥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姐姐可要跳起来了：“嗨！我们学校高中的好几个红卫兵领袖都在抢着当革委会主任。为这每天在学校用大喇叭讲演拉选票，



50年代末期由父亲在动物园拍摄的李小龙四兄妹和妈妈

咱们家还有让的！我要是高三学生，我绝不……”

“绝不怎么样？”爸爸故作严厉地问。

姐姐看看爸爸和哥哥，忽而一笑：“绝不当！绝不当！”

哥哥说到做到，当了副主任。可是一两个月后，在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学校再次改选，哥哥还是当上了铁道学院附中的校革委会主任。

“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付诸行动的一刻，如森林大火浓烟四起随风蔓延，如海啸浪潮狂呼急叫怒吼而来，其凶猛之势不可阻挡。

尖头皮鞋、大背头、西装领带花衣服，统统在大街上当场被红卫兵小将拦截，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

“阴阳头”诞生了。

满街的黄军装红袖章，灰、黑色中山装、劳动服组成了“文革”的流行色。

从学校到街道，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被红卫兵实行了监管。红卫兵从学校到社会来了个政治、经济大抄家。

我所在的宣武门小学，是我家从部队大院搬走后转进去的。宣武门小学的旁边紧挨着宣武门天主教堂。星期天在学校常能听到教堂风琴的阵阵弹奏声，那种美妙而又安详的悦耳之音常使我获得一种幸福和愉快的圣洁之感。教堂的高墙上方有四面高高的拱型窗，窗户上嵌着彩色玻璃，每天我们上早操时，金色的太阳在五彩玻璃上映出奇妙的光亮，那红的、黄的、蓝绿的闪亮就像童话世界的美丽幻像。

一天，我看见天主教堂的门大大地敞开着，人群拥进拥出。我久已渴望着去领略那里无限的欢乐，便跟着人群溜进了教堂。

教堂是窄长型的，室内本来有秩序的长椅已经七扭八歪了。我没发现耶稣像，但看见了圣母像，圣母离开了圣像座，头朝

下倒在一个角落，圣母那本应带着温婉笑意的面容，却好像和耶稣受难一样，面部充满了痛苦和无奈的神情。我来不及细看圣母像的惨状，就被一群吵吵嚷嚷的红卫兵给吸引了过去。七八个红卫兵将圣坛桌子抬向高窗的下面。又有几个人用修女的黑色裙袍兜来了一堆砖头瓦块。“让开！让开！”他们呼叫着登上桌子，向高窗上投掷石块。原来，是要把充满西方建筑情调的窗户打破。三番五次，都没有投中，这时，又有一个红卫兵



大标语贴到印尼驻华大使馆

举着一根长长的竿子进来了，竿子头上不知绑着什么铁物件，桌子上的人雀跃起来了。我看不下去了，扭头向外跑。只听见扔向玻璃窗的砖头密集起来，我知道，窗户一定会被砸中的。还没有跑

到大门口，就听到“哗啦啦”一声响，接着是一群人的欢呼和尖叫声，我扭头一看，彩色的玻璃窗打破了，枝枝杈杈还残留在窗框上的碎玻璃像一只张着獠牙的狼口。我急忙又跑向大门，拐进小学，奔向操场。

远远地看见了高窗……却再也看不见五彩缤纷的太阳光了，高墙上是一个个黑洞。

高墙下的土地上，松松的浮土中，彩色玻璃的碎片蒙上了一层土。我拣起一块蓝色的玻璃，用手抹去浮土，没想到，崭

新的玻璃碴锋利如刀，手指马上被割了一个血口子，血涌了出来，滴在刚擦干净的蓝玻璃上，玻璃变成了紫色，像深紫色的葡萄。看着血玻璃，我感到疼，绞心一样地疼……

就在这一天，我也当上了红卫兵。

红卫兵的袖章还没戴好，就被分去看管关在学校里的“牛鬼蛇神”。继北大校园刮起的揪斗旋风，各大、中、小学纷纷效仿。“斗鬼台”、“抹黑脸”、“戴高帽”、“挂牌子”、“做喷气式”，斗争形式五花八门。聂元梓公开表示：“红色恐怖万岁！”

我看管的是教音乐的男老师张某某。白面孔的张老师平日穿着打扮像个华侨，梳得很整齐的头向后背着，衬衣总是掖在腰里，皮带也不是普通皮带。永远显得笔挺的裤子下是各色随季节变换的尖头皮鞋，他大为这所市民阶层居多的学校里的学生看不惯。

“不老实就抽他！”一个高个子的女同学把一条宽皮带递过来。这位女同学出身“革干”，以胆大好说在学校知名。她经常搂着我的腰，蔑视着其他市民家庭的小学生说：“别理他们，都是社会渣滓。”大约过了几个月，她父亲便被“揪”了出来。她的“革干”父亲从一座十三层楼上跳了下来，当场身亡。那个时候，她正在学校写大字报，突然间，家里人叫她回去，从此，她不再来了。时隔二十多年后，我途经西单，总不免向那座发旧的大楼十三层瞄上两眼。

这个像归国华侨、文革初期就挨整的张老师是张志新的哥哥。我不敢接皮带，也不敢走进关人的教室。战战兢兢值了班，接受了张老师抛过来的一个阴冷的眼光，就再也不肯做这种事了。（1975年，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被捕。她创作了歌曲《谁之罪》，张志新最终被“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割断喉咙，残忍

地杀害了。从 1979 年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决定和宣传材料中，我看到了张志新一家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情况，其中还提到了这位曾在我手下当过近两小时“囚徒”的张志新的哥哥——张老师。）

肖华不让父亲离开军队，亲自组阁总政文化部创作组，白刃叔叔不顾“兵临城下”，向我们普及猫肉好吃的知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曲波盛赞山东好汉武二郎。徐怀中叔叔回味“党小组会”。

1966 年的 6 月，全国教育战线处于失控状态。那篇由王力、关锋、曹轶欧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文章煽动要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么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文章，称赞说：“写得何等好啊！”

于是，六七月间，由红卫兵小将这支不是军队、比军队还带有时代政治色彩的新军，踊跃地投身到运动高潮中来，并且转眼就成为文革初期最能付诸行动的强大力量。

在这股力量的带动下，我又被分配了一个新任务，在个女教师家里实行监管。

这是北京一所普通院落里的南房。房间不小，有 20 多平方米，家具和杂物堆得很多，女教师年纪约四五十岁，略显花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丈夫，也不知道她是教什么的。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一进屋就挤在一个小板凳上 还

是她又搬来一个小凳，让我们坐得舒服点。个男同学立刻朝她喊：“少假惺惺地装好人！”女教师不动弹了。这屋里一共有两个男同学，他们翻这看那，故意把摆放得整齐的东西推倒，之后看看女教师的反应，女教师则一声不吭。

个男生终于觉得不过瘾，拿起皮带砸向一个柜子，并提高音量说：“你平时不是拿教鞭敲桌子吗？今天你听听这声音好吗？”他把皮带抽得震天动地，我不由自主地捂上了耳朵。

“放下手！听着！”

我吓得放开了捂耳朵的手，这才发现，喝斥的不是我，上了年纪的女教师缓缓地也把手从耳朵上拿了下来。

男生得意非凡地喊：“好听吧！你再听着。”他站到一个椅子上更使劲地敲了起来，边敲边叫：“敢把手捂上去我就抽你！你这个臭婊子。”

女教师嘴里咕噜了一句什么含混不清的话。敲击者立刻停止了动作问：“你说什么呢？”

女教师不抬眼睛地说：“这院里有那么多邻居，我希望你们不要骂这样难听的，又无根据的话。”

两个男生像探知了秘密一样高兴起来：“噢！你怕让邻居听见？”他们索性放纵地齐声喊起来，一句连着一句……女教师花白的头垂了下来，彻底不说话了。男生们喊到了极限，也停止了，无聊地坐了下来。寂静中，只听见钟摆的滴答声。女教师站了起来，向门外走去。“站住！干什么去？”“我要上厕所。”“不行，你失去自由了，不能上厕所！”

女教师抬起浮肿的脸，比听到刚才那阵凌辱的喊叫还要意外地说：“什么？不能上厕所？”

“对，不能出去！”男生们又用手指了指一个白磁痰盂说：“就用这个。”女教师没动，望着男生说：“让这两个女孩带着我